

卢沟桥事变与国难书写

郭建鹏, 张昊为

(聊城大学 文学院, 山东 聊城 252059)

摘要: 1937 年至 1949 年, 围绕“卢沟桥事变”而生的报载散文、诗歌、戏剧、小说等“国难”文学作品, 着眼于社会现实, 以历史图像式叙事方式来反映日寇侵华之血腥与民众生存之惨境, 记录战乱下社会百态, 塑造了抗战战士的光辉形象, 高歌后方各界人士抗日救亡的壮举, 鞭挞卖国求荣之徒。这些作品以质朴的文字反映国难危机下的时代痕迹与特殊时期国民的精神面貌, 既补充了历史史料, 又具有极高的文学价值。

关键词: “卢沟桥事变”; 抗战; 国难书写

中图分类号: I206.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1217 (2024) 02-0096-10

收稿日期: 2024-01-10

基金项目: 聊城大学博士科研基金项目: 1931-1945 报载抗战文学研究。

作者简介: 郭建鹏 (1980-), 男, 河北昌黎人, 聊城大学文学院副教授, 文学博士;

张昊为 (1999-), 女, 山东聊城人, 聊城大学文学院硕士研究生。

DOI:10.16284/j.cnki.cn37-1401/c.2024.02.016

“卢沟桥事变”伊始, 举国哗然, 第 29 军的英勇抗战, 得到全国各界的热烈声援, 尤其是国内各大报刊对“卢沟桥事变”争相报道, 同时刊载了书写国难的诗歌、戏剧、散文和小说等文学作品。围绕事变产生的大量文学作品, 文体形式丰富, 主题内容鲜明凸出。报刊作为传播资讯、刊载文章的重要传媒工具, 成为抗战文学的重要阵地。戏剧以大众喜闻乐见的方式演绎将士们血染疆场的战时场景; 报告文学详实记录了事变经过及前线战况, 以犀利的言语抨击日本侵略者的残暴罪行; 小说以其虚构性讲述抗战英雄的故事, 表现国难下民众的态度与反应。民族危难之下, 报刊文学以其特有的方式记录战况, 鼓舞士气, 激发民众爱国情怀, 承载着沉重的国难记忆, 赓续着生生不息的民族精神。

“卢沟桥事变”爆发后, 卢沟桥成为全国人民关注的焦点, 但由于路途遥远、局势复杂, 民众无法得到及时的消息。在这关键时刻, 众多记者不顾生命危险奔赴现场, 收集前线资讯, 撰写新闻报道, 及时为民众传递了真实可靠的资讯, 展现了前线士兵的抗战图景, 并对紧张的局势进行了分析和评价, 形成了大量详实可靠的报告文学, 这些报告文学不仅从正面战场书写将士们的奋勇杀敌, 而且从侧面反映前线的紧张局势。

战火纷飞中, 各大报刊记者赶往战场采集时讯, 以战地通讯、速写、时事评论等形式记录战事。在记者群体中, 以范长江、陆诒和小方三位记者最为突出。范长江是《大公报》的著名新闻记者, 曾只身前往祖国的大西北考察, 写出了著名的《中国的西北角》。范长江一直对中日关系十分关注, “卢沟桥事变”发生后, 他奔赴前线, 采访多名将领和战士, 考察战场形势, 写出了多篇详实可靠的战地通讯。以笔名“长江”撰写的《芦沟桥畔》分别于 1937 年 7 月 24 日、26 日和 28 日连续刊登在《大公报 (上海)》上, 分“无从说起”“太息唏嘘”和“问题重重”三个部分叙述了“卢沟桥事变”发生前的局势和事变过程, 并指出当前紧张局势的岌岌可危。小方《血战居庸关》分“抢防南口”“肉搏坦克车”“新的长城”和“‘铁汉’之泪”四个小节描写了居庸关战役的战况。“肉搏坦克车”一节更是描写了战事惨烈的一幕:

怎么奈何它呢? 办法是有的, 第七连连长带着两排人跳出阵地冲向坦克车去, 他们冲到这“铁怪”的跟前, 铁怪自然少不了有好多窗口以备里面的人向外射击之用, 于是大家就不顾一切的攀上前去,

把手榴弹往窗口里丢，把手枪伸进去打，以血肉和钢铁搏斗，铁怪不支了，居然敢走，并且其中的六辆因为里面的人全都死了，所以就成了我们的战利品，两排勇敢的健儿虽然死了一半，但我们终于获得胜利。^①

二十九军虽然没有先进的武器装备，但有一群宁死不屈的战士，面对敌人先进的坦克车，战士们化肉体为铜墙铁壁，与那“铁怪”拼死争斗，以惨烈的牺牲换取了最终的胜利。

七月七日夜，日军在卢沟桥发起进攻，驻守于此的二十九军奋力抵抗，八、九两日，日军更是挑衅不断。《卢沟桥》一书中《八、九日激战》一文记录了我军勇夺卢沟桥的战争事实：

据当地人说，战事以八日晚最烈，是夜十一时许，日军二百余人由永定河东岸向河西进攻，抢夺卢沟桥，桥西我金营一排当时全军覆没，县城西门城上守城某连长眼见日军前进，我援军不继，气愤不堪，不待命令，即派一排兵士出西门往援，该排兵士丢掉步枪，持大刀手榴弹黑地里偷偷前进，行近日兵时，举刀砍杀，声震四野，日兵猝不及防，死三十余人，该排兵士中有一十九岁青年连砍日兵十三人，并生擒一人，该日兵跪地求饶，亦被砍杀。^②

这位“连砍日兵十三人的十九岁青年”多次出现在报刊的诗歌和小说中。柳林的诗歌《血虞卢沟桥》用较大篇幅描写了这位“十九岁金标小英豪”斩杀敌人的场面：

只见他手提大刀猛一跳，
第一个跳进日本战壕。
手榴弹先把七个鬼兵齐炸倒，
一脚两步上前抡大刀。
一个掉头一个砍断腿，
两个鬼子一齐呜呼了。
有一个小鬼头前跑，被金标一刀斩断腰。
血溅满身如雨洒，金标疯狂一般舞大刀。^③

营内士兵无不夸赞这位“小英雄”，民众亦被此英勇之举所激发，个个义愤填膺士气高。诗歌展现了军民团结一致抗击敌人的激动人心的场面。

这一英雄形象同样也出现在小说《白刃战》中。故事发生在七月八日的夜晚，枪声在雨的笼罩下不时传来，驻守在宛平县的廿九军廿七旅都压抑在服从上级不准行动的命令中，心里憋足了反抗的劲头。战斗的机会终于来了，战士们在营长的带领下挥着大刀痛快杀敌，他们是“长城的廿九军”，亦是“古北口的大刀队”！小说依据“连砍日兵十三人的十九岁青年”原型塑造了一个英雄人物“十九岁班长”：

十九岁的班长疯狂着，用大刀卷进敌营去。他底刀左右并排挥去，人头滚着，尸身就也向左右并排倒下来。他心中默默计算着：

“十二个了！”

于是又是一个尸身向后倒下去，这使他差点儿绊了一交。他心中想道：

“第十三个！”

他抬起头来，四下里没有敌兵了。尸身在地上泥里扭曲着，蠕动着。^④

而在田风的小说《芦沟桥上》中，这一英雄形象又变成了“中士张虎”。小说对其勇杀十三个日兵的场景进行了更为细致的描写：

中士张虎，在杀场中横冲直撞。猛然间，一只枪刺正冲着他底胸口刺将过来。他急忙躲闪过去，顺势一刀，正砍中了敌兵的咽喉。于是脖颈像甘蔗的关节似地折断了。这时候，另一个敌兵，又冲到

①小方：《血战居庸关》，《抗战半月刊》1937年第1卷第4期。

②前导书局主编：《卢沟桥》，桂林：前导书局，1937年，第131页。

③柳林：《血虞卢沟桥》，《江西地方教育》1937年第88期。

④江羽：《白刃战》，《中流（上海1936）》1937年第2卷第10期。

他底眼前，他一刀砍掉了一只肩膀。他完全失掉理性了。他底蒙着血的眼睛藉以辨别敌和友的，只靠着他们头顶上的钢盔或者军帽。他胡乱地跑着，有时向前也有时向后。他底刀每一下都见着血肉。他已经砍倒了十二个敌军。他还想要砍第十三个。^①

侵略者的残暴使民众义愤填膺，战士们的英勇使民众痛快不已。民众更是迫切想要了解战争的经过，但是战事主要依靠记者们从现场带回的消息以及事后撰写的文章。对战地通讯和报告文学，作者更注重真实性，因此其叙述内容较为真实可靠。但在小说中，作家往往以虚构的情节结合真实事件架构故事和塑造人物形象，将士兵如何冲入敌营进行厮杀的场面描写得全面、细致，让读者读后有身临战场的体验和酣畅淋漓的感觉，这也是小说与报告文学的不同之所在。

与小说的虚构叙事和报告文学的及时性和新闻性特点不同，抗战时期的诗歌以其凝练的语言和简短的篇幅抒发对日军侵略行为的愤慨和抗日救亡的殷切呼喊。在特殊环境下，旧体诗再现新活力，王冷斋的《芦沟桥纪事诗》共十五首，均为七言绝句，且每首诗都有附注，是记载“卢沟桥事变”的宝贵史料。组诗第一、二首极陈宛平城和卢沟桥所处地理位置的重要性，把宛平城比作“南北咽喉”，卢沟桥更是历史悠久、位置险要。“桥上睡狮今渐醒，似知匕首已临头”，^②说明如今局势紧张，而中国这头“睡狮”也终于觉醒，洞察出日军的侵略之意。事变发生之前的卢沟桥畔已然是“满夷氛”，日军军事演习的“嘶马鸣弦”也时常能听见，当时作为宛平县长的王冷斋更是能察觉到日军的蠢蠢欲动、局势的紧张，“河山寸土属中华，保卫毫厘敢失差”，^③写出了诗人保卫国土的责任感以及面对大敌压境的紧迫感。“卢沟桥事变”于七月七日夜之间爆发，日军“故伎重施”，借口寻找丢失士兵，进而向卢沟桥发起进攻，诗人愤怒地记载了日军发动战争的真相：

一声刁斗动孤城，报道强邻夜弄兵。月黑星沉烟雾起，时当七夕近三更。^④

面对敌人的无耻谎言和狂妄行为，守城的二十九军义愤填膺，时刻做好反击的准备。由于二十九军的顽强抵抗使日军无法支撑，日军假意“和平协商”，而中方却真的打算以“和平谈判”来解决问题。在上司的命令和指示下，诗人多次作为中方代表出面与日军进行交涉，于危难之中舌战狡猾的日方，据理力争：

挟持左右尽弓刀，谁识书生胆气豪。谈笑头颅拼一掷，余生早已付鸿毛。^⑤

履险如夷终不险，似归视死竟安归。天高一任鸿飞渺，凝望孤城正曙晖。^⑥

诗人始终抱着视死如归的心态完成一次次的交涉，在民族危难面前，个人生死早已如鸿毛般轻薄。但日军却利用协商的时间间隙加紧军事防备，而我方在这一方面多有懈怠，军事防备并不严密，士兵准备亦不充足。八、九两日日军展开了猛烈进攻，双方交火。诗歌展现了交战的激烈场面：

暗影沉沉夜战酣，大刀队里出奇男。霜锋闪处寒倭胆，牧马胡儿不敢南。^⑦

这是一场我军大刀队突袭敌营的战斗，“夜战酣”点明了战争时间是夜晚，战况激烈、胶着。将士们的大刀“霜锋闪处”令倭寇胆寒，凸显出“大刀队”的勇猛与无畏，敌军在大刀队的铁血刀锋下惊慌不已、畏葸不前。除此之外，诗歌还歌颂了吉星文、冯志安等爱国将领：

喋血前驱不顾身，裹伤再战勇无伦。舍生赴死原难死，始信星文是吉人。^⑧

冯异孤忠终为汉，赵云大义独知刘。男儿卫国同心志，妄效狙公动诡谋。^⑨

而处在旋涡中央的宛平城更是炮火频繁，经此战乱后满目疮痍，百姓流离失所：

满目疮痍困待苏，乞邻将伯费频呼。失家纵有流离苦，得粟差无冻馁虞。^⑩

王冷斋的组诗《芦沟桥纪事诗》以纪实的手法再现了“卢沟桥事变”，抒写了对日本军队侵略行为的愤慨，歌颂了众多爱国将领和二十九军将士们不惧敌人、奋勇杀敌的壮举，是对国难的真实记录，不仅为“卢沟桥事变”的文学研究提供了宝贵的史料，而且展现出国难面前一代文人的骨气与豪迈、中华民族的坚韧不屈。

①田风：《芦沟桥上》，《中流（上海1936）》1937年第2卷第10期。

②③④⑤⑥⑦⑧⑨⑩王冷斋：《芦沟桥纪事诗》，《时事新报（重庆）》1944年7月7日第6版。

围绕“卢沟桥事变”所创作的国难戏剧以另一种方式书写国难，大批剧作家、业余爱好者纷纷加入创作行列，紧紧围绕“抗日救亡”的主题进行创作，各剧团的排演也是快马加鞭。戏剧以喜闻乐见的演绎方式、凭借着较强的感染力影响民众，面向广大的农民群体、工人群众，呼吁全民族团结起来，抗战救国。

在这特殊时期，剧作家们从“为艺术创作”走向“为现实创作”，时间紧迫的情况下，为及时让民众通过戏剧了解时局，创作出的戏剧作品在艺术上难免会有些粗糙。但文艺界空前团结，创作激情空前高涨，他们迫切想要通过戏剧向人们揭露侵略者的真实意图、告诫落后同胞、呼吁全民族抗日救亡。文艺界紧密团结在一起，共同为了抗日救亡而努力，集体创作、共同出演是这一时期戏剧创作的特点。由多位作家合作完成的三幕剧《保卫卢沟桥》，全面展现了“卢沟桥事变”的发展过程。第一幕“暴风雨的前夕”，事变爆发前日军在卢沟桥附近以“演习”为幌子进行挑衅，其嚣张行为惹怒居住在附近的百姓，百姓们发出“把鬼子兵赶出去”的怒吼，局势紧张，战争一触即发；第二幕“卢沟桥是我们的坟墓”，展现了事变发生的过程，被日军烧杀抢掠的百姓向卢沟桥附近驻守的军队求救，战士们想要救援，却因上级命令“不准轻举妄动”而无法解救遭受炮火袭击的百姓，最终战士们奋起反抗，英勇地击杀敌人；第三幕“全民的抗战”描写了军民合作共同抵抗敌人的热烈场面，广大民众把身边可用的农具作为武器，和将士们一起奋勇杀敌，毫无畏惧，这一幕将全剧推向高潮。此外，在抗战戏剧中有一类“反正”题材的戏剧，这类戏剧描写了消灭汉奸的故事，揭露了汉奸的丑恶行径，歌颂了我军将士英勇机智的抗敌斗争。当日军向北平大举进攻之时，通县“冀东防共自治政府”所辖保安队第一、第二总队官兵在总队长张庆余和张砚田的率领下，于1937年7月28日发动武装起义，全歼通县城内日军四百余人，活捉汉奸殷汝耕，收复通县。此次武装起义打击了日本侵略者及汉奸的嚣张气焰，鼓舞了前线抗战的士气。以此次抗敌事件为底本的两部戏剧《反正》（洗群作，记录了冀东自治政府保安队第一大队反正的过程，表达了队员们不愿做汉奸叛徒的坚定决心和爱国热情）、《通州城外》（尤兢作，描写了保安队与二十九军合作活捉大汉奸殷汝耕的英雄事迹）中，“反正”将士们与前线作战的军队相比，他们的“力量”薄弱，不能直接与日军交战，但他们通过铲除汉奸政权的方式来削弱日本侵略者在后方的扩张势力，震慑卖国的汉奸群体，极大地支持了正面抗战。

二

国难事件是一个国家和民族的历史记忆和苦难书写，而作为个体的普通民众更是直接承受炮火侵袭的受害者和悲惨遭遇的亲历者。前线战士以血肉之躯抵御敌人炮火，无奈敌人仍然侵入了后方，对百姓进行残忍的奴役和杀害，致使大量百姓流离失所，不得不离开故土、逃难至各地寻求庇护和救助。张悦仁的《大红门战场视察》记录了“大红门事件”两军冲突后，作者从永定门乘车到大红门战场路程中所见之情景。作者刚乘车出发，便看见了大量难民“驱车出广安门，西驰十余里，抵大井村，沿途扶老携幼之难民，多用大车满载大小包裹什物等正向北平逃难”。^①而随后作者在北平大街上看见了被炸毁的日军汽车、日军留下的斑斑血迹以及武器弹药，虽然这一场战争已经结束、造成的恐慌已渐渐平息，但街道上到处可见战争痕迹，而奔赴赶来的难民不知又将遭受怎样的苦难。张悦仁在另一篇报告文学《芦沟桥难民的痛哭》中详细记录了一个难民椎心泣血的讲述。作者于七月十一日一早外出视察情形，途中偶遇一个老人带着一个幼女前去难民收容所，老人乞求作者怜悯施舍，作者领二人于一小饭馆饱食，吃饭过程中老人讲述了他的悲惨经历：

大雨前夕，我一家四口，正在呼呼入睡之际，突被屋外枪声所惊醒，初皆莫明其妙，以为匪劫。……其时枪声稍止。行至中途，将近村正住宅约数十武，迎面忽见日武装兵一队，约二十余人，正用麻绳捆缚村正，押着走来。时已天明，我见情况不妙，急藏身于道旁麦田内，举首外望。闻村正大声曰：“你们打死我也没用，咱村中没人开过枪，也没人敢窝藏。你们要不信咱的话，你们就搜你们的。”

^①张悦仁：《大红门战场视察纪》，《新闻报》1937年7月19日第14版。

语方毕，日兵中有一稍高者，似属官佐，挥令其部下四散向村街前进，村正仍被放下，押着同行。^①老人作为村副，本想起身探查村内情形，不料正碰上村正被日本兵抓住，便藏身于旁，然后想要去宛平县报告，谁知日本兵岗哨颇严，只能原路返家。而家中也早已是一片触目惊心：儿子儿媳被抓去做杂役，只留孙女在门口哭泣。村正生死不明，老人只好领着孙女一路逃难至此。老人叙说完事情经过，愤慨道：“我真不知道是怎么一回事，先几年，地面上都吃着大兵们的苦头，还不过是自己人，倒也罢了。如今怎么在自己的地面上，反而吃起人家的苦头来，这才真的活不成了。”^②言语的悲愤无奈却早已化作眼泪，无声地诉说着遭受的苦难。

对中国百姓的奴役却只是日本侵略者最“仁慈”的一面，他们的罪行并没有因此而止步，而是变本加厉、丧心病狂。在记者小方笔下的《芦沟桥抗战记》中，日军的两次进攻遭到了二十九军的顽强抵抗，均以失败告终，竟把失败的怒火发泄到无辜百姓身上，“农民们被强迫着割平自己的庄田；不止此也，割完之后，还被活活的埋在地上，只留一个头在外边，等他们慢慢死去。至于妇女们所遭遇的命运，更不忍想像了！”^③作者把日本侵略者比作“野兽”，把他们这种行径说作“野蛮的暴戾行为发作起来”，可谓是准确地表现出了侵略者身上非人性的丑恶本质，把残杀无辜百姓生命当做游戏，当真是“兽性”发作，肆意施展淫威。

陆诒的《在抗战的前线（二）》中描写了“敌人们的铁骑”对中国百姓生命的随意践踏以及敌机轰炸造成的大量死伤：

敌人们的铁骑早已践踏了农民们血汗交流的农田，不但如此，而且日军到处，四出找寻中国妇女，供他们这批侵略兽军做慰劳品，谁没有姊妹，谁能忍受兽兵污辱中国妇女的兽行？农民们都给他们拉去当伕子，稍一不遂，动辄以刺刀戳入华人的腹部，肠血逆流，这样残酷的杀人行为，决不是人类所能做出的，最惨者，他们所认为排日的人，捕去后往往被他们活埋，全身埋在地下，地面上只露出一个头，这种空前残忍的杀人新方法，使人死起来，又痛苦，又慢性！^④

侵占中国的领土、活埋农民、找寻妇女做“慰劳品”，如此惨绝人寰的“兽兵兽行”点燃了作者满腔怒火，立刻燃烧成了熊熊斗志，“敌人这种残暴的行为，不会使我们害怕，只该使我们更咬牙切齿，坚强抗战到底的决心！”^⑤为了死去的苦难的同胞们，必须团结抗敌，放弃妥协的想法，将这群“野兽”赶出中国的大地。被日军侵占的中国大地上流淌着遇难同胞的鲜血，而在天空之中，“敌人的飞机又出动大轰炸，七时以后，长辛店上空，竟有十五架敌机大施轰炸，炸弹着地的声响，随着军民伤亡最后的惨叫声，闹成一片，街头成了死尸的堆积所，在长辛店的人们，谁都挣扎在生死线的边缘，前几分钟尚有呼吸，却不能保障后一分钟内，是否已血肉横飞了！”^⑥文章不仅对敌机轰炸的场面进行了真实描写，而且细致描写了处于轰炸中人们随时丧生的境况和极度恐惧的心理，可见战争不仅残害人们的身体，而且折磨着人们的心灵。

如果说敌人的炮火侵袭是对城市的摧毁，烧杀抢掠是对人们肉体的折磨，那么对新闻界和教育界的控制就是对中国民众心灵的钳制。日本侵略者跨过卢沟桥，踏入北平，对北平各界进行打压和破坏，《敌骑纵横下的故都》详细记录了日本侵略者对北平各界的破坏活动。新闻界受尽摧残，记者多被逮捕；对教育界的破坏有三点：一驱逐学生，二逮捕教授，三焚毁书籍、修改课本。日军还联合警局搜查“三民主义”及“共产主义”书籍，禁止学校讲授相关知识，企图实行殖民地文化侵略政策，从精神上控制和驯化国民。面对敌人的嚣张气焰，军民本该团结一致，共同御敌，但仍有人卖国投敌，甘愿做汉奸，百姓们在遭受外来侵略者折磨的同时，还承受了汉奸们的迫害。顾一樵创作的三幕剧《古城烽火》就刻画了沦陷区清末遗民的丑态和汉奸的真实面目。北平沦陷后，前任清吏部尚书张文熙及其儿子张鸿图为首的汉奸集团，在利益的驱使下卖国求荣，为了当上伪政府的警察厅长，张鸿图不惜出卖自己的亲妹妹。作品将汉奸叛徒的丑恶行

①②张悦仁：《芦沟桥难民的痛泪》，《新闻报》1937年7月20日第17版。

③小方：《芦沟桥抗战记》，《世界知识》1937年第6卷第10期。

④⑤⑥陆诒：《在抗战的前线（二）》，《新闻报》1937年8月5日第7版。

径昭之于世，以此激励和鼓舞民众抗敌救国，也警醒民众莫要贪图一时利益而背叛祖国和人民，成为千古罪人。

日军对中国每一寸国土的蚕食，都夹杂着对中国人民的奴役和残害，从肉体残害到思想控制，战火从前线战场绵延至房屋村舍。不同作家群体对日军的罪行进行了不同视角、不同方面的真实记录和悲惨书写，将侵略者残暴丑陋的形象毫不留情地展露在世人面前，传达出历史沉重的声音和人民撕心裂肺的呼嚎。

三

日本侵略者们肆意践踏中国民众的生命尊严，烧杀抢掠、无恶不作，用文字来还原历史、记录民族灾难的过程，也孕育着愤怒与反抗、呐喊与救亡的力量。“卢沟桥事变”后，以抗日救亡为主题的诗歌如雨后春笋般生长，记录了诗人们的所思所想，饱含愤怒忧怨的感情喷薄而出，希冀在奔走呼号中唤起更多同胞的抗日激情。任钧的《与打击者以打击》以无比激愤的感情表达了对日本侵略者的怒火，鼓舞国人勇敢还击：

“与打击者以打击”！

让我们把阴险的毒蛇赶走吧，
难道我们还没有忍受够吗？

像哑巴的弱女
不断地忍受恶汉的蹂躏和猖狂——
六年来，我们忍受了东北的沦陷！
忍受了冀察的“特殊化”！
更忍受了冀东傀儡的登场！

但敌人的胃袋却更加扩张：
如今又在芦沟桥畔。
企图把“九一八”的拿手好戏重新演唱！
企图把血腥的“日徽旗”竖立在整个华北，
竖在黄河，竖在长江！

“与打击者以打击”！

让我们把无可理喻的疯狗打死吧，
的确，我们已经忍受够啦！^①

以“阴险的毒蛇”和“恶汉”比喻日本侵略者，以“哑巴的弱女”比喻长期隐忍、积贫积弱的中国，形象的比喻和对比一针见血地指出中国所处的“千钧一发”的危急局势。紧接着陈述六年来日军的嚣张气焰：占领东北、控制冀察、建立汉奸傀儡政权，如此种种仍然使敌人“胃口”不减，如今已经将魔爪伸向了卢沟桥畔，难道眼睁睁看着日军将“日徽旗”“竖在黄河，竖在长江”吗？诗歌结尾，诗人近乎疯狂地再次发出“与打击者以打击”的呼喊，激励同胞奋起反抗，打倒侵略者。

赵顾年的《芦沟桥是我们的坟》歌颂驻守宛平城的将士们坚守阵地的果敢，激励他们坚决与敌人对抗到底，绝不让出一寸一毫的土地：

^①任钧：《“与打击者以打击”！》，《浙江省民众教育辅导半月刊》1937年第3卷第19期。

“芦沟桥是我们的坟”，
唱出这雄壮的歌声！
这是敌人千万重压迫
榨成我们的一片军心。

军心的巩固有如磐石，
看，我们宁死守着
不让敌人的铁蹄，
踏进一寸宛平城！

不怕炮火多磨紧，
杀，杀，杀，杀呀！
杀退虎狼的□□兵！
起来，起来，我们的少年军！

“芦沟桥是我们的坟”，
我们要唱出这雄壮的歌声！^①

“芦沟桥是我们的坟”贯穿诗歌首尾，也是全诗思想的中心。我军战士宁死不屈，守卫国土，战士们的肉体即是卢沟桥的最后一道防线，以卢沟桥为坟墓也再所不惜。诗人发出悲壮的呼喊，激励“少年军”前赴后继，杀退敌人，保卫卢沟桥。

著名诗人臧克家创作长诗《除了抗战什么都没意义》，痛斥日本侵略者的狼子野心，悉数被侵略的中国大地的满目疮痍，痛心不已、焦急万分地呼吁还没有觉醒、仍然麻木的社会各阶层共同抗敌：

学者们呵！
把身子移开那一堆故纸吧，
而今的真理已不在故纸上！
诗人们呵！
请放开你们的喉咙，
除了高唱战歌，
你们的诗句哑然无声！
……
工人，农民呵，
快伸开粗大的手吧，
祖国正用着你们！^②

众多爱国将领不仅战斗在一线，而且能以质朴简洁的语言抒发内心感情。爱国将领冯玉祥拼杀在一线，但笔耕不辍，坚持作诗。他说自己是一介武夫，是个大兵，将“兵”字上下拆分，就是“丘”字和“八”字，并自称为“丘八诗”。其诗语言质朴，通俗易懂，感情炙热，有着鲜明特色，是宣传抗日救亡诗歌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冯玉祥的诗歌多为短诗，内容浅显直白，却字字铿锵有力，《打蜈蚣》一诗就痛陈日军的侵略罪行，号召全国人民反抗侵略者：

日本军阀，与此正同，
吞我土地，杀我民众，

①赵顾年：《芦沟桥是我们的坟》，《立报》1937年7月15日第2版。

②臧克家：《除了抗战什么都没意义》，《光明（上海1936）》1937年战时号外5。

凡我同胞，痛须思痛，
赶紧起来，打此毒虫。

.....

努力努力，全国拼命，
紧紧踏住，万勿放松！
行见此害，命将告终！^①

诗人描写了社会各阶层民众的抗战行动，号召大家紧密团结在一起，共同反抗日本侵略者。例如《检查》描写了日兵调戏和侮辱等车的两名中国女郎，引发了周围同胞的满腔怒火，他们共同与日军抵抗，发出“我们可杀不可辱，愿同倭寇同归于尽！你用枪炮我空手，若不拼完不甘心！我们死是中国的鬼，活着是中国人”^②的慷慨呼声，反映了中国民众同仇敌忾的英勇气概。《反正》以热河一带士兵抗日的举动为例，反映各地士兵抗日救亡热情高涨。《铁》描写了国民党政府不积极抵抗政策下众多抗战人士的愤怒与无奈，这更加激发了他们抗战救亡的决心：

我有力量打倒强暴！
我有力量把国耻雪湔！
等到获得了最后胜利，
我更能把新的中国兴建！^③

曾为冯玉祥部下的另一爱国将领宋哲元，在“九一八”事变后通电全国，请缨抗日，“卢沟桥”事变发生后，率领部队奋起反抗。所作的《杀敌救国诗》四首同样以高昂的基调鼓舞中国同胞抵御外敌，第一首叙述了自“九一八”事变后日军在各地的侵略扩张，占领东三省、强占平津、进攻上海等地，中国已经到了最紧要的关头。第二首描述了日军烧杀抢掠的种种罪行，罄竹难书，呼吁“中华好男儿”为国尽忠，杀敌报国。第三首则大力呼吁社会各界“救国莫因循”，抗日救亡不止上阵杀敌，后方救济同样重要，鼓励民众积极支持抗战。第四首展现我军打击侵略者的英勇，以此鼓舞士气，发出“中国一定胜”的豪情壮志，把抗战救亡的情感推到了最高点。

社会各界组成众多“慰劳团”，较多报告文学中都提到了“慰劳团”对前线士兵、受伤将士们的慰问，他们及时送去物资，并给予战士们心灵上的抚慰和鼓励。漪嘉的《劳军记》描写了八人组成的慰劳团前往城墙慰劳士兵，送去慰劳品，守城将士多次激动地说道“抗敌是我们应有的责任，实在不敢接受大家的敬意。”^④刘诚的《在龙王庙受伤的——献给刘连长和栗文华勇士》则写了在“卢沟桥事变”发生的第四天，北平大学学生组成慰劳队去“陆军后方伤兵医院”慰劳受伤将士，慰劳队给受伤将士们带去了精神上的鼓舞，而将士们的坚强乐观和保家卫国的责任担当也极大地感染和激励着这些学生。

青年学生也是抗日救亡中不可忽视的力量，他们带着朝阳般的活力与激情，积极投身于抗日救亡的活动中：无论是背上行囊积极参军，还是走上街头进行宣传，都彰显出中国青年在国难面前的责任与担当。卢沟桥的炮声虽然已经打响，但仍有很多民众没有觉醒，抗日救亡的宣传仍需要继续。芷夫的《阳光下》写了一群青年学生在街头宣传抗日救亡知识的热烈场面；《参加战区服务团》这篇通讯则描写了青年学生抗日救亡的另一种方式，他们呼吁更多学生参加战区服务团，合编队伍，随时做好为前线服务的准备；田汉的四幕话剧《卢沟桥》描写了青年学生组成的慰劳队上前线支援抗日战士的故事，该剧以“七七”事变前后为背景，热情讴歌了宛平县人民群众、青年学生和二十九军士兵的爱国精神。同时愤怒地揭开了日本侵略者假谈和真进攻的狰狞面目，抨击了国民政府的不抵抗政策，表达了抗战必胜的信念和坚决斗争到底的决心，道出了当时广大中国人民的呼声，起到了宣传鼓动抗日的积极作用。青年学生走上了抗日救亡的道

① 冯玉祥：《打蜈蚣》，《抗战（上海）》1937年第5期。

② 冯玉祥：《检查》，《抵抗》1937年第15期。

③ 冯玉祥：《铁》，《抵抗》1937年第10期。

④ 漪嘉：《劳军记》，《中流（上海1936）》1937年第2卷第10期。

路，普通民众也用不同的方式支援部队、反抗侵略者，体现了国难之中的国家情感与民族精神。《两周间》描写了北平各界自发形成的救亡运动：

在往年，这三伏节季正是休息的时间，然而，在此刻，全市各界的工作反倒加紧了，掏茅房的粪夫，倒脏土的土车夫，送水的水车夫，都把每天应做的工作提前做完，利用剩余时间自动帮助扫街夫到马路上搬运石块，沙袋，建筑防御工事。

警察带领着一辆辆的洋车到各米粮店购买麻袋，值钱多少按照市价。

米粮店老板悉数把麻袋交出。等警察交钱时，老板却和颜悦色地拒绝：

“老乡，我们绝不能要钱。你们老乡们黑夜白日辛辛苦苦地替国家打仗，我们买卖人丝毫不能帮忙你们就够惭愧的了，几条破麻袋值什么？那能要钱呢？”

仿佛预先有所协订，走遍全市的米粮店，各家都是如此。

各闹市商家伙友们，都掏包凑钱买西瓜，预备茶水，供给值岗士兵吃喝。

十几岁的小学生们在炙热的阳光曝晒下沿街捐款。岗警劝阻，说是：上方有命令，不许捐钱给士兵；因为兵士打仗是应尽天职。学生们固执，仍然要捐，被劝阻急了就号啕大哭，哀痛非常，有如受了极大委屈。^①

戏剧创作中也有很多作品反映了后方民众的爱国救亡运动，李白凤的《卢沟桥的烽火》展现了后方医院的伤兵要求去前线继续作战的感人场面；在李增援的独幕街头剧《盲哑恨》中，一个盲人以自己悲惨的遭遇揭露了日军的残暴行为，激励同胞坚决与日军抗争直至战争胜利；左明的儿童剧《梦游北平》以上海一户普通人家为中心，叙述了三个孩子的父亲在保卫北平的战争中光荣牺牲、全家陷入了悲伤的故事。作家对因战争而失去亲人的家庭给予深切的同情，同时将抗战胜利的希望寄托于孩子身上，希望他们能够努力报国。

在抗战小说的创作中，作家的视角更多地集中在市民阶层的生活上。《七月八日的晚上》描写了“卢沟桥事变”后民众的反应与态度，小说将视线放在普通工人身上。小说以七月八日夜间的一次工人讨论为背景，描写了普通工人抗日救亡的决心和热情。为了救国，争取整个民族的自由解放，工人们“谁也不愿意把自己底话放在肚子里，尽情地谈”。^② 他们甚至愿意与平时欺压他们的老板合作，体现普通民众从大局出发，紧密团结在抗日救亡旗帜下的爱国热情。李辉英的《往那里逃》展现了国难之下民众不同的心态。“卢沟桥事变”导致北平城内人心惶惶，一户周姓人家因为要不要离开北平而发生争执，想要出逃的父亲和坚持留在北平抗日救亡的儿子之间的争执尤其激烈：

“我叫你进城你就得进城！”

“我不能听命！”儿子反抗着，“我要救国！”

“但你也要救家！”

“家并不危急！”

“你不能固执！”

“命运决定我这样作啊！”^③

父亲担心战乱中的北平动乱不安，母亲和女儿也始终惊慌不已，三人坚持逃离北平去往上海，只有儿子坚决要留在北平支援前线。最终儿子为了抗日救亡留在了北平，胆小的父亲及母亲女儿则离开了北平。小说塑造了一些只顾家庭，对战事漠不关心的北平市民形象。卢沟桥畔的炮声响起，惊醒了许多沉睡的民众，他们愤恨于日寇的凶残，感动于将士的英勇杀敌，积极投身于抗日救亡的洪流中，但这并不是民众的全部形象，其中还是有些人面对震耳欲聋的炮声只想着自己的小家庭。国家的危亡、民族的命运在这些人眼中仿佛都与自己无关。他们只看到了自己的“小家庭”，想着“往哪里逃”，而忽视了国家这个“大家庭”。可

① 澎湖：《两周间》，《中流（上海 1936）》1937 年第 2 卷第 10 期。

② 张春桥：《七月八日的晚上》，《中流（上海 1936）》1937 年第 2 卷第 10 期。

③ 李辉英：《往那里逃》，《光明（上海 1936）》1937 年第 3 卷第 5 期。

惜这样的人在事变中不在少数,《往那里逃》揭露了抗战时一些落后分子的狭隘保守心理,丰富了抗战初期文学中的人物形象和主题内容。

“卢沟桥事变”引发了报刊文学以各类文体形式描摹国难下的家国图景,不管是对前线将士们奋勇杀敌保卫国家的歌颂,还是对后方社会各界热血满腔抗日救亡的记录,以及对日本侵略者种种罪行的还原,都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和极高的文学价值。一方面,报刊文学是对历史史料的极大贡献,在战争场面、社会救亡等多方面补充历史;另一方面,报刊文学对“卢沟桥事变”的国难书写,得以让后人触摸到历史的伤痕,听到历史的声音,透过一行行质朴珍贵的文字洞察到国难危机下的痕迹,窥探特殊时期国民的精神面貌。文学记录着一个国家和民族的光辉荣耀,也反射出她曾承受的深重苦难。有关“卢沟桥事变”的报刊文学记录了中日军队激烈的战争场面,也传达着中华民族愤怒的嘶吼,更是激励和鼓舞着全民抗战的勇气。国难书写是不可磨灭的历史记忆,它记载了一个国家最沉重的伤痛,却也象征着一个民族最坚挺的脊梁。

The Lugou Bridge Incident and the Writing of National Troubles

GUO Jian-peng, ZHANG Hao-wei

(School of Literature, Liaocheng University, Liaocheng 252059, China)

Abstract: Through the investigation and collation of “The Lugou Bridge Incident” works published in the newspapers from 1937 to 1949, it is found that these literary works, such as prose, poetry, drama, novels and so on, which were born around the “national tragedy”, focused on the reality of the society, reflected the bloodshed of the Japanese invasion of China and the miserable conditions of the people’s survival through the historical pictorial narrative, portrayed the glorious image of the anti-Japanese war fighters, sang the feat of anti-Japanese salvation of people from all walks of life at the rear, and scorned the warlords. Reflecting the bloody invasion of China by the Japanese invaders and the tragic situation of the people’s survival, recording the social conditions under the war, shaping the glorious image of anti-war fighters, singing the anti-Japanese salvation of people from all walks of life in the rear, and lashing out at those who sell out the country to seek honour and glory. Through the simple words, the book provides an insight into the traces of the national crisis and the spiritual outlook of the people in the special period, which not only supplements the historical materials, but also has a profound literary value.

Keywords: “The Lugou Bridge Incident”; war of resistance; writing about national troubles

[责任编辑 唐音]